

· 文史探讨 ·

留美幼童若干史实考证

黄松平¹, 屈婷婷²

(国防科技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72)

摘要: 留美幼童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的群体, 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and 作用史有定论, 毋庸赘述。然而, 在具体史实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准确甚至讹误的内容。基于史料对文祥去世是否耽搁幼童留美, 幼童留美获批的曲折过程和曾国藩的最后一份奏折进行考证。

关键词: 留美幼童; 文祥; 曾国藩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3605(2014) 01 - 0109 - 04

留美幼童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的群体, 开创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河, 他们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 这一段历史历来为人们所注目, 围绕留美幼童的专著论文可谓洋洋大观。但人们对于留美幼童的记述却有不少不准确甚至讹误的内容。笔者利用详实资料对留美幼童若干史实进行了考证: 一、幼童留美是否因文祥去世耽搁? 二、幼童留美获批过程是否如人所言一蹴而就? 三、《奏陈选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及应办事宜折》是否为曾国藩一生的最后一份奏折?

一、文祥去世耽搁幼童留美与史实不符

文祥去世耽搁幼童留美的观点最早出自夏东元先生所著的《洋务运动史》。夏东元先生在该书中写道: 关于留学事宜的建议, 容闳最先直接与谈的官员是被他称之“志同道合”的丁日昌。1868 年初, 丁日昌从上海道升任江苏巡抚不久, 容即去苏州公署拜谒, “语以所谓教育计划, 丁大赞许, 且甚注意此事,

命予速具详细说帖”。容闳乃拟条陈四项, 除设轮船公司、开矿和限制教会权力作为陪衬外, 着重谈“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 以为国家储蓄人材”之事。丁日昌以之上于总署文祥, 文不久去世, 此事遂搁置下来。^{[1] P411} 因为该书在洋务运动领域的权威性, 这一观点影响深远, 以至于后来很多的论著在述及幼童留美时不加考证地引用此论。兹举一两例来说明: 如《西学东渐——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一书中写到“1868 年, 容闳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当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是一个很开明的人, 对引进西方科技很热心, 他是容闳的熟人和朋友。他让容闳准备好文件, 由他转给朝廷里主持军务的军机大臣文祥向皇帝奏请。文祥也是个开明的人, 极力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巧没过多久文祥病逝了, 这件事就没有了下文”。^{[2] P128} 《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中也写到: 1868 年, 容闳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政府呈奏《条陈四则》, 在《条陈四则》第二条, 容闳提出“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 送之出洋留学, 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

收稿日期: 2013 - 09 - 26

作者简介: 1. 黄松平, 男, 湖南靖州人, 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科技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科学技术与社会; 2. 屈婷婷, 女, 江西南昌人, 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科技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军事技术与社会。

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这是容闳审时度势,第一次将其多年来的教育设想化为十分周详的留学计划上奏清廷。《条陈四则》由丁日昌寄给协办大学士、户部左侍郎文祥转奏,不料文祥丁忧回籍并不久去世,容闳的留学计划被搁置。^[4]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通过查阅文祥的生卒年月便不难发现,“文祥去世耽搁幼童留美”的观点显然与史实不符。文祥生于1818年,1876年因病去世,字博川,号文山。对于文祥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经历,《清史稿》有明确记载“八年(同治八年,即1869年——笔者注,丁母忧,特赐谕祭。百日假满,病未出。天津教案起,力疾还朝。十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一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十三年,病久不瘳,在告,会日本窥台湾,强出筹战守”。^[5]据《郭嵩焘日记》记载,光绪元年(1875年)元月十一日,因海疆多事郭嵩焘奉诏入京时,“往见博川,在内室谈了两小时之久”。^[6]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也述及文祥的去世:“1876年,靠着秉性和机敏在宫廷中赢得各派尊重的文祥病死。”^[7]可见他是在留美幼童出国(1872年)后四年才去世的,比推动幼童留美的曾国藩还晚去世四年,显然不会耽搁幼童出美留学之事。从《清史稿》中可知,在留美幼童出国两年后的1874年,发生了日本侵台事件,文祥还偕恭亲王议兴海防,共同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加强海防、抵御外侮的措施,由此引发了著名的“海防之议”。及至光绪二年(1876年),文祥已病不能出,自知且不起,乃秘疏上曰“驭外之端,为国家第一要务。现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8]疏上,未几卒。另外,论文《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中提到丁日昌代陈《条陈四则》时文祥的官职为协办大学士、户部左侍郎也值得商榷。文祥因政见与恭亲王奕訢相同,庚申之变后得到接连提升,遍任工、兵、户、吏部尚书,成为洋务派在清

廷中枢的代表人物之一。文祥于1862年(同治元年)即连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为内务府大臣,兼都统。1865年,署户部尚书,辞内务府大臣。1871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次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光绪帝继位后,晋武英殿大学士,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由此可见,文祥是1871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丁日昌呈奏《条陈四则》时(1868年)还不是协办大学士。而文祥1865年即署户部尚书,户部左侍郎是户部的副职,官职偏低,明显与文祥当时(即1868年)的身份不符。《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一书中显然也弄错了文祥的官职:“条陈写好后,由丁日昌寄给协办大学士、户部左侍郎文祥转奏”。^[9] P23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只需弄清文祥的生卒年份即可避免的错误呢?笔者推测很可能来自容闳的《西学东渐记》里。据容闳在该书中写道“此条陈上后两阅月,丁抚自苏驰函告予,谓文相国内艰。盖中国礼制,凡现任职官,遭父母之丧,谓之‘丁艰’。丁艰必退职,居丧三年,不得与闻政事。……得第二次噩耗,希望几灭。盖文祥居丧不三月,亦相继为古人矣。予目的怀之十年,不得一试,才见萌蘖,遽遭严霜,亦安能无怏怏哉!”^[10] P88由此可见,在容闳回忆中,1868年条陈(指《条陈四则》——笔者注)通过丁日昌上书总理衙门,然而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恰好此时遭遇丁艰,文祥居丧不足三个月自己也去世了。显然,容闳将文祥的去世日期记为1968年与史实不符。对于容闳来说,这也是情有可原的。《西学东渐记》是容闳迁居美国后创作的自传性回忆录,因身在美国,缺乏一手文献资料,且撰写此书时容闳年近八旬,对一些历史事实的回忆难免出错。因《西学东渐记》是研究留美幼童必不可少的资料,容闳有关文祥的回忆也被后人广为引用。从《洋务运动史》一书可以看出,夏东元先生读过《西学东渐记》,并多次引用该书。

二、幼童留美获批并非一蹴而就

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11] P171在清朝

这样一个依祖法旧例办事的王朝,一桩没有先例的大事要获得通过,相当艰难。从创办同文馆开始,科技这一新事物的出现,都是经过激烈斗争才获得生存的。“局内创一事而群相阻挠,制一械而讥靡费”。^{[1] P232}在保守与革新的斗争中,有的科技引进被发展,有些则被否定,有些则旷日持久地拖延。如同文馆为了建天文馆,整整拖延了20多年,原因是找不到一处不犯风水的地方。封建保守观念阻碍近代化的步伐,由此可见一斑。^{[1] P448-449}“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1] P402}因此,其遇到的阻力可以想见。然而,一些作者在论述幼童留美时显然忽略了促成此事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如秦姍发表在《湖北档案》2010年第10期发表的《留美幼童:晚清首批官派留学生》一文中提到,为“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曾国藩与李鸿章联衔上奏朝廷,要求朝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清同治皇帝很快恩准,清廷为此特别制订了《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容闳被任命为留美学生副监督。^[1]

读完该文,相信很多读者会认为,同治皇帝很有眼光,幼童留美的奏折一到他那里便大笔一挥地“很快恩准”了,并且还为此特别制订了章程,态度何其积极。然而,实际上却并不如此顺利。在对出国留学趋之若鹜的今天,人们很难想象当初在国内上洋学堂都被视为有辱祖宗门楣之事,如果要到“番邦”去拜“洋鬼子”为师,那更是被认为是叛祖逆宗的不孝之举,想当年郭嵩焘出使英法时,湖南人就骂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再加上那时中国闭关自守,对世界事务一无所知。高级官吏认为西方教育对其社会起破坏作用,所以根本提不到日程上来。此外通过几万里的海洋将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能否安全到达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尤其在农村,对外界了解很少,没有学生敢出国。由此可见,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之艰难,所受到的阻力之大,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强权开道,难度如此之大,反对声如此之多,手续如此繁杂,涉及面又如此之广的留学之路将是很难走得通的。^[1]正因为如此,当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时,“前任江苏巡抚丁日昌奉旨来津会办,屡屡与曾国藩商榷,拟选聪颖幼童

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1] P402}曾国藩深韪其言。于是在同治九年九月十六日的《奏带陈兰彬至江南办理机器片》中论证了派学生出国肄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试探性地同治帝推荐陈兰彬主持留学事宜“该员(指陈兰彬——笔者注)系奉旨交臣差遣之员,此次仍拟带至江南,于目前操练轮船,将来肄业西洋各事,必能实力讲求,悉心规划”。^{[1] P117}显然,一开始清政府对曾国藩的建议并未引起不重视。“曾国藩的奏折在北京搁置了两个月之久”。^{[1] P579}同治十年正月十二日,曾国藩再在《钦奉諭旨复陈夷务折》中,把“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作为筹议海防江防讲求实际的大要三端之一,并称“彼来则延访,我往则就教,总求尽彼之长而后已”。^{[1] P171}“曾国藩第一个奏折上递后,清廷未置可否。这时曾国藩已由直隶总督改调第三次任两江总督,离直隶前,他寻求接任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1]混迹官场多年的曾国藩深知出国留学是推行一种新型的开放文化政策的创举,他们从事的是一种极大冒犯朝野正统舆论的事业,必然要遭受时论之非议。此前“同文馆之争”中守旧派的阻挠给他的触动是深刻的。其实,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对任何带有西方影响的创新抵制得都很厉害,李鸿章经营洋务数十年,发出“三十年来日在谣诼之中”^{[1] P232}的自叹就与守旧派的处处掣肘不无关系。曾国藩意识到要推动此事,联合更多的封疆大吏会衔具奏无疑可以减杀守旧派的阻力,也可以降低自己承担的风险。于是从同治十年十月至同治十一年十一月,曾国藩乃与李鸿章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复往返函商”。^{[1] P492}李鸿章认为选派聪颖子弟赴美国学习一事,“先须议订条款,预备经费……,若有眉目,请尊处挈敝衙会奏,断不可望事由中发”。^{[1] P295}通过函商总理衙门,并得到允许,同治十年七月,曾国藩与李鸿章会衔具奏了对中国后来影响至巨的《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折》,该奏折附上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酌议章程,恭呈御览。奏折后来批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议。同治十一年正月,曾国藩、李鸿章对奏稿进行商议修订后再次上奏清廷,在这篇题为《奏陈选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及应办

事宜折》中提议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荔秋)为正委员,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为副委员,主持幼童留美事宜。这已经是曾国藩关于幼童留美的第四次奏稿了。在这些奏折的基础之上,酝酿多年的派遣学生出洋肄业的建议历经坎坷,终于得到了批准。“曾国藩在自己的最后一段岁月里走到了他一生中最远的地方,当第一批留美学童在黄埔江边登上横渡太平洋的邮船时,他离开人世已逾五个月了”。^{[17] P51}这充分显示了洋务派对此事的踌躇迟疑,也反映了幼童留美的曲折。

三、《奏陈选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及应办事宜折》非曾国藩最后一份奏折

岳麓书社2011年修订出版的《曾国藩全集》为研究曾国藩提供了便利,有助于我们厘清一些历史史实。对于曾国藩的奏折,历来为学界关注。然而,究竟那一份奏折为其最后一份奏折,也存在几种说法,值得澄清。如《曾国藩晚年对中国近代化事业的贡献——洋务运动的故事(三)》一文中写道“在逝世前的15天,即1872年2月27日,曾国藩领衔上奏(指《奏陈选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及应办事宜折》——笔者注),‘力陈派幼童出国之必要’,恳请朝廷尽快督促办理,并对派遣留学生的准备工作、留学生出国后的管理、学成回国后的委用提出了详尽的意见,他特别强调‘此系选定官生,不可半途而废。’这是他一生中发出的最后一份奏折”。^{[18] P64}参考新修订的《曾国藩全集?奏稿》,我们发现这一观点显然与史实不符。曾国藩在与李鸿章会衔具奏的这份折子奉旨日期为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此后曾国藩还有六份奏折上奏,具体为《谢赏福寿恩折》(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年终密考折》(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会商鄂湘淮盐引地折》(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与吴棠、王文韶会衔具奏)、《开办淮北丁卯纲日期片》(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遵照新章甄别同知直隶州知州等官员折》(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病体垂危谨由梅后照代递遗折》(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王定国调补莲花营都司折》(与刘坤一会衔具奏,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五日,日期为奉旨之日)。由此可见,《奏陈选派委员携带幼童

出洋肄业及应办事宜折》显然不是曾国藩一生中发出的最后一份奏折,准确的提法应该称其为曾国藩一生最后发出的几份奏折之一。

参考文献:

- [1] 夏东元. 洋务运动史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 [2] 樊洪业, 王扬宗. 西学东渐——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 [3] 茆诗珍. 留美幼童对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D].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5.
- [4] 赵尔巽等. 清史稿(卷386)·列传一百七十三 [M].
- [5] 郭嵩焘日记(三)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 [6] 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7] 李喜所. 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 [8] 容闳. 西学东渐记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 [9] 鲁迅全集(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10]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六)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 [11] 杜石然, 林庆元, 郭金彬.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 [12]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 [13] 秦姗. 留美幼童: 晚清首批官派留学生 [J]. 湖北档案, 2010, (10).
- [14] 曹前有. 论李鸿章对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的积极影响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1, (8).
- [15] 樊百川. 清季的洋务新政(第一卷)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 [16] 李鸿章全集(第六册) [M]. 北京: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
- [17] 杨国强. 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彷徨: 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8.
- [18] 白皋. 曾国藩晚年对中国近代化事业的贡献——洋务运动的故事(三) [J]. 人物, 2011, (4).

责任编辑: 秦小珊